

清扫“战场”的勇士:没有可能、疑似,只有百分百



本报首席记者 王索妮
通讯员 章松来 黄昕昕

回首过去这一个多月的经历,陈建弟觉得没有比“幸运却又后怕”这几个字来形容更为贴切了。他所在的城市——与武汉相隔千里的温州,自1月17日发现首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后,一度成为全省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在温州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工作的陈建弟,年底刚从同事手中接过医疗废物管理业务,抗疫那段时光对他来说,异常漫长而又煎熬。

涉疫医疗废物没有“可能”“疑似”这一说,只有“百分百”——医护人员的防护服、病区的快餐盒、病人的呕吐物等等,百分之百含有病菌。这类医废的处置工作一旦出了问题,陈建弟说,那就一定是“天大的问题”。

近两个月后的3月12日,温州对外宣布已连续23天实现确诊病例“零新增”,严守在防疫工作最后一道防线的陈建弟,终于

可以稍稍喘口气,像往常一样应付日常琐屑了。

“最多坚持半个月”

在年前第一次和医废处置单位对接时,陈建弟就感到问题比想象中要棘手。

温州共有两家医疗废物处置单位。在2003年非典疫情暴发后,医疗废物的无害化处理提上日程,两家中处置能力较大的温州市公用集团下属的环境发展公司,就诞生于这种背景下。

“可以说一开始对于这场疫情的预判,几乎都来自抗击非典的经验。”公用集团环发公司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党支部书记周祥雷直言,1月23日浙江在全国率先宣布启动重大公共突发卫生事件一级响应时,在公用集团统一部署下,环发公司就着手准备打好这场硬仗。“但说实话,感觉和当年抗击非典的情形还是不太一样。”

最切身的感受,就是对医疗防护用品的需求程度。涉疫医疗废物处理人员,是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除一线医务工作者外,离传染源最近的群体之一。早期防护用品短缺的问题,在这个群体中凸显出来。

“看目前的存量,大概还能坚持多久?”面对陈建弟一行人的疑问,周祥雷没有回避:“最多半个月。”

如果防护不到位,二次感染风险就会大大增加,最坏的结果,便是整个处置厂因人员和环境造成感染而停产。这将是一场灾难。

那段时间,只要看到微信群里有捐赠医疗物资的信息,陈建弟都会留意。不过他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询问过后,大多数捐赠者都表示医疗物资是留给医疗卫生机构的,主动提出捐给医废处置单位的,几乎没有,“有些人甚至是聊起来之后才知道,哦,原来还有这样的单位在做这样的事情。”陈建弟觉得,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有些被忽视了。

紧缺的不仅仅是防护装备,还有医废处理工作者。与此同时,根据《医疗废物管理条例》,医疗废物停留的时间应不超过48小时,而抗疫期间,涉疫医疗废物又必须“日产日清”,可当时由于运输车辆高速公路检查、村庄设卡检查等问题,医废运输效率变低。

“就感觉很多事都一股脑儿砸了过来,完全不给人喘息的机会。”陈建弟坦言。

被忽视的“逆行者”

抗疫路上,从不缺逆行的勇士。湖北

人张飞或许是最不起眼却又最不可少的那一位。

作为公用集团环发公司医废运输队的一员,每天一大早,他和搭档黄斌然、黄晓龙就要穿着严严实实的医用防护服,戴着防化手套、医用口罩和护目镜,穿梭于温州地区各疫情防控定点医院之间,清运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温州市人民医院(娄桥院区)每日产生的医疗废物。

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是温州医疗废物产量最大的医院,于1月29日被列为新冠肺炎重症病人定点救治医疗机构,普通人避之则吉。但张飞和搭档们却像往常一样,以日产日清为目标,每天行车258公里,从早6点出车到晚7点回停车场,将收集的医疗废物运送到位于洞头区小门岛的温州市综合材料生态处置中心,第一时间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理。

不同于普通生活垃圾可以依赖机械工具辅助搬运,医疗废物只能依靠人力一箱箱搬抬,期间还得小心翼翼。大伙儿弯腰、抬手的姿势做多了,“有时候胳膊、腰酸到晚上都动弹不得”。

最让队员们感到难捱的,还有来自心理的压力。“如果谁突然咳嗽,就会忍不住想自己是不是被感染了。前期多少会有些恐慌。”不过好在,安全防护层层加码。张飞说,厂里设立了污染区、隔离区和洁净区,消杀的次数从一天两次上升为一天四次,而最让大家安心的,还有原本紧缺的防护用品有了着落。

“这其中离不开公用集团的全力支持,也离不开环保部门的积极协调。”周祥雷说,正是因为各方的努力,医疗废物环保处置物资得以及时供给,“防护十分到位,直到现在在我们无一人被感染。”(下转2版)

全省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5.77%

这场降事故的人民战争究竟是怎么打的?

本报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浙交宣

76岁的王彩珠放心穿过曾事故频发的S315省道,到村老年食堂吃上热乎饭;泰顺一条曾被称为“死人弯”的长下坡,在经过“靶向治理”后变成了“放心路”;台州医院急诊科重症病房里的车祸伤员越来越少,因为全市严重交通事故大幅下降……这两年,关于浙江平安交通的好消息越来越多。

交通安全如同空气,看似寻常却弥足珍贵。如何实现老百姓对交通安全的期盼?浙江交警用数据来说话。在日前召开

的全省公安工作会议上,一组数据十分亮眼:2019年在全省机动车和驾驶人均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全省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同比下降15.77%!降幅的背后,是浙江交警用超常手段为百姓系上的“安全带”。

一个400多人的微信群 “盯着”事故预防

在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镇长陈锋的微信里,有一个400余人的“全市事故预防微信群”,各县(市、区)党政领导,乡镇街道及全市各级公安、交通等部门负责人都在里面。全市每天的交通事故数、亡人数、同比幅度等核心数据,相关工作部署调整等,都会在这个群里及时公布。“即便是深夜,只要有警情通报,大家都会紧密关注,认真研判安全形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就怕有任何疏漏。”陈锋说。

交通安全治理的重心和落脚点在基层,重点和难点也在基层。基层领导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在台州,与事故预防微信群一同建立起来的,还有交通事故领导干部到场制。

2017年8月3日,椒江大桥发生一起2

人死亡交通事故,按照到场制要求,椒江区相关负责人,市、区两级公安、交警领导等全都赶到现场,一同踏勘事故现场。

进一步分析后发现,路面设施不完善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领导当场拍板,在中间双实线隔离带安装反光道钉,严格落实大货车和拖拉机限行措施,对桥上实行限行限速抓拍等。相关负责人感慨地说,以前对交管工作的印象只是管管交通秩序,到了现场才真切感受到它对守护生命的意义。

这个制度在2019年4月成了全省的明文规定——《浙江省道路交通事故领导干部到场暂行规定》下发,明确了5种伤亡事故情形下,政府及职能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到场,以便发现安全隐患,及时治理解决。目前,领导干部到场率已达95%以上。

这仅是浙江推进道路交通安全协同共治的一景。我省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一直在探索“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社会化管理路子,在《2017年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要点》中明确了各部门的任务清单;而在2018年的省委、省政府“平安浙江”考核中,首次将电动自行车、工程车等车辆的交通死亡事故列入考核项目。



马路“难”过 货车“难”开 都是为了道路更安全

“你们把路口封起来,我上班要多走路,太不方便了!”在交通设施提升过程中,或许会出现这样的质疑。可让路“难走”的原因,实则让人心惊肉跳——浙江公安交警部门根据近几年的事故大数据,分析出在亡人交通事故中,行人和电动车、摩托车的死亡人数占比超过90%!

其中,最大的原因在于道路机非混合,海盐县的通元大道就是这样一条路。要解决问题,机非隔离是最有效的手段。2019年7月,海盐当地政府在该路段增设2.2公里中央隔离护栏、信号灯、电子警察等设备,同时将原有的54个道路开口减少至7个。虽然行人过马路“难”了,但交通事故大幅减少,当年7月至9月的接警量同比下降50%,且未发生亡人事故。(下转2版)

浙江公告
信用服务平台
公告刊登、公告查询请扫

律企联
中小企业免费法律咨询平台